

贾府师门范居长

——记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陈思和



范伯群

的神态，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范先生说话时，在温和的语调后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那个时期，范伯群先生掌苏州大学中文学科。苏州大学是在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面是看望老师，也是向贾先生请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我记得他经常把一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天说地，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及范门弟子。其实在高校里担任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但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范先生被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费，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影响，到了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式转型，在 80 年代井喷式地出版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作家论。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一种作家谱系。看似边缘化了的作家，恰恰是 80 年代以后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另类作家谱系，正是他们早年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生晚年研究张资平，范先生则一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范先生研究通俗文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了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编辑一百多种现代文学流派、社团、作家的资料集，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资料。因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在

苏州，文学所就把这个编书任务交给了苏州大学，由范伯群先生主持。范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起先并不想接这个任务，觉得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批判对象，很难处理。后来编完了资料集的初稿，他寄给贾植芳先生审读，贾先生看到资料编辑体例，第一辑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第二辑才是有关通俗文学的资料。那天我在贾先生身边，先生指着书稿笑着对我说，你看，还是大批判开路啊。后来他大约把这个意见与范先生说了，第二稿编成，体例次序变换过来了。这就是说，范先生是在学术实践中，对通俗文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向于同情的理解，渐渐地，他逐步修正了自己原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成为一个卓越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大家。几乎在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也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武侠小说，他不但亲自研究，而且自己想动手写武侠小说。他多次与范先生相约，要去苏州大学住一段时期，集中时间读一批武侠小说，但最终是因工作太忙，章先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章先生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家，他从古代禁书、明清小说的传统理解通俗文学的意义，自有其学术渊源，然而范先生是从研究鲁迅、现代文学起步的，要从这个传统立场转型到研究通俗文学、肯定通俗文学、甚至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进而发展成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不是肯定了通俗文学而否定新文学（这在当今国学热、传统热的思潮里是屡见不鲜的陋见），而是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双翼齐飞的学术见解。但即使如此，他的见解也遭到过质疑和反诘，我几

次看到范先生与反对者的辩论实录，也当场见过他与同行们的学术辩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范先生表面温和和儒雅的谈风里，始终伴随着一股凌厉之气。

由这股凌厉之气，我想起了章先生有一次回忆贾先生教学影响时说的，他说他在古代文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常有人讥之为“邪派武功”，他却以这个“邪派武功”而自豪，他公开说，这就是贾植芳先生传授给他的。我想范先生学术上的凌厉之气与曾先生学术上能够绵里藏针的风格，大约都是有一点这个“邪派武功”的基因。这正是贾植芳先生留给他的学生极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记得先生经常嘲笑那些躲在书斋里点燃一支香烟也怕烧痛手指头的学术庸人，鼓励他的学生要解放思想、大胆去探索历史真相、追求学术真理，不要在所谓学院派的华盖下唯唯诺诺，甘做帮闲。我在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等人的学术传统里，都看到了这样一种朗朗做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因此，我要说，范伯群先生早年的学术起步，晚年学术集大成的辉煌，都是与复旦大学和贾植芳先生的学统密不可分。他受教于贾植芳先生，受累于胡风冤案，在鲁迅-胡风为代表的新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做学问的知识和做人的榜样，并且在实践磨难中砥砺出高贵人格。范先生平时在工作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老师竭诚以待，情同父子；对学生诲之不倦，爱护慈祥。但在是非原则问题上，爱憎分明毫不苟且。这个品格，也是贾先生、章先生、曾先生继承于鲁迅的精神品格，正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范先生去世后，我拟了一副挽联，综合了我对范先生的上述理解，敬献于范先生灵前：

贾师倚闾曾章念切仙界高坛又召绝顶智叟
迅翁风骨鸳鸯蝴蝶传奇学府何处再觅双翼巨鹏
范先生千古

中国敦煌学研究需要更好地走出去

■柴剑虹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我们的学术著作与文化普及读物的外译宣传工作，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外译项目等，资助种类及款项逐年增加，但其中申报的敦煌学图书种类却非常少。如 2016 年的“经典中国”项目，共申报 1369 种，敦煌学仅 3 种：《解读敦煌——敦煌装饰艺术》（樊锦诗、关友惠著）、《解读敦煌——发现藏经洞》（樊锦诗、罗华庆著）、《敦煌史话》（柴剑虹、刘进宝著）。该年的“丝路书香”项目，共申报 2321 种，敦煌学仅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一种。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们翻译引进的外国敦煌学论著已数以百计，而国内有关论著的外译却寥寥无几。

老一辈著名敦煌学家的著作（包括普及读物）已外译的寥若晨星，我所知道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潘絮兹《敦煌莫高窟艺

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由土居淑子译为日文于 1981 年出版，书名改为《敦煌的石窟艺术》；另一种是常书鸿等编《敦煌的艺术宝藏》，1980 年由文物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英文本，书名 Art Treasures Dunhuang。

此外，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述论》曾出版韩文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也于近年出版了韩文本。我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走近敦煌”丛书 12 本，入选 2013 年“经典中国”项目，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在高田时雄教授大力支持下，由他组织并亲自监译，将其中郝春文、荣新江、高启安的三本著作译成日文，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

至于我国敦煌学学术期刊、辑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一个概略的统计。《敦煌研究》创刊至今刊文 5000 余篇，《敦煌吐鲁番研究》1-17 卷刊文约 300 篇，《敦煌

学辑刊》1980 年至今 98 期刊文约 1500 篇，（港、台）《敦煌学》至今 30 辑，刊文约 300 篇。以上四刊发表的论文总计逾 7000 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学者的中文文章，有多少篇被全文外译？我虽无调查，但估计也是微乎其微吧！如果说在对外经贸上，我们常常以“顺差”自傲，那么在文化学术的交流上，却是典型的“逆差”。

即便是已经外译的敦煌学著作，其翻译质量如何，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例如我与进宝教授合著的《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英文双语版，2010），近年已相继被译成俄文、德文本出版。德文我不懂，但全书却没有我们作者的署名。俄文本我稍能阅读，匆匆浏览，发现的问题却使我触目惊心。例如书中引述季羨林先生的话：“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俄译本却删去了“再没有”之后的文字，季老强调的核心内容被消失了。书中劫掠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的名字，俄国的奥登堡不见了；他们拍摄的 2000 余张考察照片被缩减成了 200 张；列举的敦煌所出古文书目前的收藏地居然删去了中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的名字。

要加强敦煌学学术著作及敦煌文化艺术普及读物的对外宣传推广，增加外译数量，提高外译质量，必须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注重推介好作品，鼓励作者、出版者与国外专家学者携手合作，充分利用相关平台，这是促进敦煌学研究与文化普及国际化的必要步骤。如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日文五卷本即是典型例证，前述“走近敦煌”丛书的翻译也是成功之例。听说赵声良研究员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荣获 2016 年中国好书奖后，经作者与美国、日本的专家的合作，其英文、日文本的翻译工作正在顺利进展之中。这些都是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学术交流、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之举。